

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编

战后日本的

中国现代史研究综述

宫长为 赵德生 高乐才译



延边大学出版社

战后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综述

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编

宫长为 赵德生 高乐才译

徐喜辰 史维雍校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88年·延吉

责任校对：宫长为

战后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综述

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编

宫长为 赵德生 高乐才译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

长春市总工会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5 插页：4

字数：120千字 印数：1—4000册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34-0119-9/K·8

定价：1.80元

译者前言

本书是译自日本历年出版的《日本历史学的发展与现状》(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山川出版社)一书中有关中国部分,它是由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编辑的,现已出版六集,每集都是日本国为出席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历史学会议而编写的一种报告书,其内容包括开会前五年日本国内史学界研究日本史、东洋史和西洋史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皆由各方面的专家执笔整理形成。原书分为日文版和英文版两种,自第四集起据介绍英文版不再是日文版的全译,而只是摘译日文版中的重要部分,我们是根据日文版翻译的。

在每一集的中国部分,分为殷周、战国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现代史部分,均按先综合介绍评述,后附有关论著目录的形式编写。在综合评述中将中国各阶段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各种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情况做了扼要的总结和深入的评述,能使读者窥见日本历史学界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态度、方法和学风,了解这期间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情况,后边的论著目录,也可以作为一种资料索引,掌握其研究信息。

需要指出的是,原书是从日本恢复国际历史学会议委员后的一九五三年开始编写的,但从第一集中介绍和评述的有关中国历史研究情况来看,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往往追溯到一九五三年前的研究情形。陕西三秦出版社已出版了中国古代

史部分(即殷周、战国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因此,我们把现代部分的译稿定名为《战后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综述》出版,使得古代部分与现代部分连成一体,配套成书,这将是大有益处的。

《日本历史的发展与现状》一书,由于最早是在五十年代出版的,所以,在我国国内流传极少,据说前几集目前在日本国内已很难买到。我们的材料来源,除第五集外,都是日本国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池田雄一教授复制惠赠的,在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共青团吉林省委青年运动史研究室和延边大学出版社诸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为了保持原书的本来面目,对于原著中显然与我们不同的词语和观点等,都未作任何更动,一仍其旧;为了忠实于原文,我们采取了直译的原则,只作了一些文字润色。全书由宫长为、赵德生、高乐才译出,徐喜辰、史维雍校对。权赫秀、牛辅恒、杨有海同志也参加了部分校译工作。书后附有日本近期关于五四运动和有关青年学生运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由于我们日文水平不高,虽然对译稿作了几次复校,书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对工业、农业、商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意义,已被愈来愈多的人们所了解。但是,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似乎还未曾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信息实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当务之急。只有迅速而又准确地掌握国内外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信息,才能避免大量的无效劳动,才能腾出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迅速

提高，以适应一日千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进的步伐。这也正是本书译者的宗旨所在。

徐 喜 辰

1988年3月

目 录

译者前言	徐喜辰 (1)
一、1953年至1957年的研究综述	市古宙三 执笔 (1)
二、1958年至1962年的研究综述	古岛和雄 执笔 (14)
三、1963年至1967年的研究综述	今崛诚二 执笔 (25)
四、1968年至1972年的研究综述	今崛诚二 执笔 (41)
五、1973年至1977年的研究综述	横山英 执笔 (57)
六、1978年至1982年的研究综述	野泽丰 执笔 (72)

附录〔一〕五四运动中的的民众斗争 味冈彻 著

一、序言

二、五四运动的展开——全国情况

三、五四运动时期各种势力的联合与对立

四、结语

附录〔二〕北京大学与军阀 小林善文 著

——蔡元培的改革及围绕改革的斗争

一、序言

二、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三、北京大学防卫斗争的开展

四、结束语

一、1953年至1957年的研究综述

市古宙三执笔

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来考虑是比较妥当的。所谓两个时期，就是近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现代（五四运动以后）。

首先，简要地纵观一下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动向：1937年以前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和对近代以前的中国的研究极为活跃的情况相比，真是寥寥无几，它的研究几乎全由矢野仁一一人来垄断。这种状态在1937~1945年的战争中间也没有改变，只是除矢野仁一外，又增加了二、三个崭露头角的研究者而已。可是战争一结束，情况骤然发生了变化。其变化不单纯是从事考证的研究人员数量增加了，研究领域的扩大也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战前的研究几乎仅限于国际关系，而战后不但从国际关系方面，来掌握中国的问题，还明显地增加了打算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去掌握中国内部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这种新的倾向大概不是因为日本人把中国看成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对象，而是因为把中国当作完成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的国家，才对这个国家本身的发展关心起来的结果。

下面按年代的顺序，看一下主要的研究成果。

揭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的是鸦片、亚罗两次战争。首先着手研究这些战争的是矢野仁一。他的研究成果，现在仍旧可以说是了解这两次战争全貌的最方便的材料。①不过，他的

研究在现在看来，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史料方面，落伍于时代的情况并不是没有的。藤田正典②、卫藤沈吉③为了弥补矢野研究的这种缺点，就另从新的观点出发来考察鸦片战争以前的中英关系。藤田通过清英印的三角贸易，说明了十七、十八世纪的中英关系，卫藤则注意到在中英贸易之中当地贸易商人的活动，他指出—进入十九世纪，这些当地的贸易商人便掌握了广东贸易的领导权，迫使东印度公司废除了其贸易垄断权，终至凭借武力让中国实行了开放。

鸦片战争的结果，中英两国缔结了《南京条约》，从这以后近一个世纪间，中国一直呻吟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之中。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研究，过去只不过在关于租界方面④有值得一读的论文，而今通过外交谈判来分析中国官员行动方式的尝试文章，最近很多。植田捷雄⑤、坂野正高⑥根据初期的对外交涉考察了这些方面，同样的尝试还有河村一夫⑦试图对义和团事变之际的李鸿章、荣禄所进行的考察，以及矢泽利彦⑧通过教案来分析官员的行动方式的探索。

鸦片战争培养了广东地方中国人的反英情绪。因此，从该战争进行时起直到亚罗战争发生的期间内，广东地方接连不断地发生了排英的事件。铃木中正⑨、寺广映雄⑩都研究了这些排英事件，但其看法未必相同。铃木把这些排外运动看成主要是乡绅的运动，而寺广则作为群众的排外、反官的运动来看待。

如果说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中国，仍旧拒绝承认自己为国际社会之一员。那么，亚罗战争的失败，已经不允许继续持有这样的态度了。因此，《北京条约》的缔结不久，在1861年1月设立了相当于外交部的总理衙门。乍一看，设立外交部之类似乎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却是一

桩重大事件。坂野正高^⑪从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两方面详细地探讨了设立过程，据此分析了当时中国内部的势力关系、西方列强的势力关系和中国、西方各国的对外办法。

鸦片战争、亚罗战争是十九世纪中叶来自外部的动摇了传统中国的事件。与此同时，国内也同样发生了动摇传统中国基础的事件，这就是太平天国之乱。这个问题的研究在总的来说很薄弱的研究近代中国的领域中，已经较早地就在进行了，但是从1950年到1954年却显得特别活跃，先后发表了河鳍源治^⑫、波多野善大^⑬、增井经夫^⑭、市古宙三^⑮等人的研究成果。通观这些研究，我们发现在太平天国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即市古把太平天国运动看成是以周官为模式的运动，认为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只能是神权国家，而决不能产生出新的中国。相反，增井认为如果拿出各个部分来看，无论哪一部分都尽是陈旧的东西，可是若从整体看，它却有与走向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有联系的新的因素。河鳍运用丰富的资料，考察了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乡官制度，并和市古同样地指出太平天国制度的落后性。但是，和市古不同，他力图在太平天国中找出些什么新的东西来。

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后，兴起了一场要把西方的武器、弹药和科学技术引进中国的运动，这就是所说的洋务运动。其首倡者是林则徐，其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可以说是李鸿章。田中正美^⑯通过林则徐的禁烟意见，分析了他的态度和想法，小野信尔^⑰查清了支撑李鸿章的政治活动的经济背景，认为那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绅商。在辅助李鸿章的颇有能力的幕僚中，有个叫做冯桂芬的，关于他的生涯及其著作，有百濑弘^⑱的研究。除此之外，小野川秀美^⑲针对整个

洋务派的思想发生、思想变迁以及它和变法思想不同之处都做了明确的阐述。

洋务派在表面上所标榜的目标是达到中国的富国强兵，可是，洋务运动的结果，表现在中法战争、日中战争中的却是凄惨的战败。日中战争的原因，必须从日本、中国两个方面来考察。但在日本往往偏于单是从日本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北村敬直^②鉴于这种缺点，通过欲阻止日本侵略朝鲜的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活动，弄清了战争之前中国内部的情形。还有田保桥洁^③详细地追寻了朝鲜的内幕和日中之间围绕朝鲜的纠纷，明确了日中战争的原因，并进而考察了日中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田保桥的考察，都是以日本为中心而进行的，而矢野仁一^④则以中国为中心，弄清了从日中战争直到义和团事变期间的国际关系。日中战争的结果，日本在中国获得了许多特权，其中有在通商口岸经营企业的企业权。有人怀疑这可能是日本在他国的唆使下所获得的，波多野善大^⑤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是根据日本自己的意见取得这一特权的。佐佐木正哉^⑥还弄清了在这时期使用过炉银进行交易的营口商人的性质。

日中战争，使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痛感到在吸取西方文明时也必须采用其政治制度。这部分人被称为变法派、维新派。野村浩一^⑦追寻了直到变法派的巨头康有为为止的变法学说的传承，小野川秀美^⑧论述了清末变法论的形成过程和进化论对它的影响。野村、小野川都认为变法派具有近代性，可是，板野长八^⑨分析康有为、梁启超的大同学说后，认为他们的思想结局仍然是近代以前的。

有关西方列强在日中战争后攫取权利的竞争的研究，几乎是空白。里井彦七郎^⑩通过教案分析了传教士的活动，弄

清了他们带有帝国主义的任务，并且考察了教民的形成过程及其阶级结构。一般认为义和团运动是这些教案中最大的一次，可是对其研究却不多。江口朴郎^②概括观察了义和团运动后，强调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扬，可是，市古宙三^③却强调了其匪徒的、会党的性质，认为它的排外运动只不过是盲目的排外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村松祐次^④的一系列研究。他认为义和团是由最初的乡团式组织发展成反满的会党式组织，后来又进一步转化为得到清政府公开承认的义和团的，他想要通过义和团搞清当时的社会经济状态。再有，各国在义和团事变初期出兵的情况，有田保桥洁^⑤的研究。

1900年，当义和团和联军正在北方作战时，在长江中游地带，唐才常率领的独立军纷纷起义。永井算己^⑥、菊池贵晴^⑦都论及了这只独立军，其见解虽然多少有所不同，但是就认为这一事件是表示变法派放弃清王朝、转向革命派的过渡的时期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章炳麟也是在这个时期从立宪派转变为革命派的一个人，他的思想被小野川秀美^⑧、岛田虔次^⑨做了锐利地分析。

1900年以来，培育中国革命运动的地方是日本。可是这个革命运动在日本却受到日本政府的镇压，永井算己^⑩弄清楚了它曾是怎样充满了苦难的。

革命派在中国的活动，可以认为是一个大有明确之必要的课题，可是承担这项课题的研究却不多。波多野善大综合考察了清末屡次发生于各地的农民暴动，想要弄清清末的阶级结构^⑪，并且比较和考察了北方的北洋陆军和南方的新军^⑫，他指出，双方的士兵都是趋于没落的小农子弟，可是前者成了袁世凯的私兵，后者则成了革命的母体，他还进而作出下面的结论：成为辛亥革命领导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当时对于农民的问题并没有具体的认识和加以解决的办法，但是他们以农民和新军作为场地把他们连结起来，使之成了革命的群众组织。再有，波多野④分析了孙文的民生主义——当时的民生主义是以平均地权为其内容的，认为它是受到了J·S·穆勒的影响。反之，永井算己④则以为是受到日本明治时代的土地社会主义者宫崎民藏的影响的结果。北山康夫④则弄清了武昌革命派的系统。

比起对革命派的研究来，对立宪派的研究反而是活跃的。菊池贵晴④通过排斥日货、美货的行动，指出当时热衷于收回主权运动的不是革命派，而是立宪派资产阶级。对于这一点，藤井正夫④通过铁路问题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藤井又进一步追寻了立宪派资产阶级以铁路问题为原因，逐渐走向革命化的经过。还有内田直作④同样地从铁路问题考察了资产阶级，指出了从商人转化成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明白了他们不能成为辛亥革命的承担者。以上都是通过排斥外货和铁路问题来研究资产阶级的。野泽丰④则企图通过研究立宪派资产阶级的巨头张謇，来阐明这种资产阶级的性质。

1911年，清政府决定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但是这件事却成了引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首先在四川突然发生了暴动，继而，于十月十日在武昌发生了革命。波多野善大④认为颁布这个铁道干线收归国有令的背景，是有邮传大臣盛宣怀个人指望汉阳铁厂兴隆的欲望和清政府想在铁路上找到财源的愿望。田中正美④、市古宙三④都研究了四川的暴动，田中认为铁路问题唯独在四川发展成了暴动，是因为收回铁路的办法对四川来说比其他省份不利。市古追寻了铁路国营问题发生以后直到四川独立的原委，弄清了结局是立宪派与军人掌握了四川的政权。对于民国初年，几乎毫无研究，仅

仅由里井彦七郎⑤⑥、新岛淳良⑤⑦对于创建中国共产党有功的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做了些研究，野泽丰⑤⑧则通过中日实业公司阐明了民国初年中国政界的势力关系以及它和日本的勾结。

下面转到由五四运动开始的现代。对这个时期的研究，战前有铃江言一、橘朴、田中忠夫、波多野乾一等人活跃，颇有生气。战后对这个时期的研究，并没有达到象对近代的研究那样兴旺，这大概是由于日本国内的资料在战后已经散乱，并且已经不能在现场（指中国）进行研究的缘故。不过在最近，对这个时期的研究也兴旺起来了，而且引人注目的是其研究几乎都是以中国共产党为对象的。

对于初期的中共，留下很多研究成果的是石川忠雄⑤⑨。石川和三上谛昕⑤⑩一起研究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还进一步阐明了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对革命的基本政策、构成这一政策之基础的对现状的分析和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接着又考察了把重点放在城市工作上的“李立三路线”，他认为，代替李立三在中共掌握权力的留苏学生派，基本上也是采取与“李立三”路线无异的城市工作重点主义。所以，李立三和留苏学生派的斗争，只不过是单纯的权力之争而已。

总的来说，石川强调的是：中共的行动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村松祐次⑤⑪考察了出现在中共正式文件中的“封建”和“反封建”词语的意义，认为它不是从历史唯物论的发展阶段学说中产生的理论性词语，而是从实践中和实际中产生的词语。中共的战斗方向，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而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制订出来的。还有今堀诚二⑤⑫根据毛泽东的从指导湖南农民运动时期起到瑞金政府成立时期

止的著作，研究了毛泽东对阶级划分的发展。

中共力量的显著扩大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可以认为这是由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治战略方式大大发挥了作用的结果。因此，卫藤沈吉⑦探求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治战略方式的形成过程。再有，中共力量的扩大，不消说是大大有赖于中共的土地政策的。因此，古岛和雄⑧追寻了中共的土地政策在抗日时期以及内战时期的变迁，并阐明了它怎样演变为解放后的土地政策的。

另一方面，藤田正典⑨把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壮大的原因从精神方面来考虑，他从1942年开始的第一次整风运动里找到了它的原因。与上述各篇论文的题目稍有异趣的是山本澄子⑩的研究，山本论述了从二十世纪初起直到现在的三自爱国运动为止的中国基督教新教徒所走过的道路。

注 释

①矢野仁一：《鸦片战争和香港》，东京1939年；矢野仁一《亚罗战争和圆明园》，东京，1939年。

②藤田正典：《十七、八世纪时期的英中通商关系》，《东亚论丛》第1辑，1939年。

③卫藤沈吉：《在鸦片战争前英国商人的性质》，《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8辑，1952年；卫藤沈吉：《炮舰政策的形成》，《国际法外交杂志》53卷3期，1954年。

④植田捷雄：《中国租界的研究》，东京，1941年。

⑤植田捷雄：《鸦片战争和清末官民的各种形相》，《国际法外交杂志》50卷3期，1951年。

⑥坂野正高：《在外交谈判中清末官员的行动方式——以一八五四年的修改条约谈判作为中心的一项考察》，《国际法外交杂志》48卷4—6期，1949年；坂野正高：《对一八四八年青浦事件的一项考

察》，《东京都立大学人文科学》第2辑，1954年。

⑦河村一夫：《关于李鸿章》，《历史教育》5卷1—3期，1957年；河村一夫：《义和团事变时期荣禄的事迹》，《历史教育》4卷1—3期，1956年

⑧矢泽利彦：《长江流域教案的一项考察》，《近代中国研究》第1辑，1958年。

⑨铃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的起源》，《史学杂志》62卷10期，1953年。

⑩寺广映雄：《广东的抗英运动》，《大阪学艺大学人文科学》第3辑，1954年。

⑪坂野正高：《设立总理衙门的背景》，《国际法外交杂志》51卷4、5期，52卷3期，1953年；坂野正高：《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朝外事机构的动摇》，《国际法外交杂志》55卷6期、56卷1期，1957年；坂野正高：《设立总理衙门的经过》，《近代中国研究》第1辑，1958年。

⑫河靖源治：《天朝田亩制度的产生》，《东洋学报》33卷2期，1951年；河靖源治：《太平天国设立乡官的实际情况》，《东方学论集》第1辑，1954年；河靖源治：《太平天国之设立乡官与其背景》，《史学杂志》63卷6期，1954年。

⑬波多野善大：《有关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历史学研究》150辑，1951年。

⑭增井经夫：《太平天国》，东京，1951年。

⑮市古宙三：《太平天国诏书的修改》，《东洋学报》33卷2期，1951年；市古宙三：《太平天国的赞美诗》，《和田博士六十寿辰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51年。

⑯田中正美：《反鸦片论者的立场》，《东洋史学论集》第4辑，1955年。

⑰小野信尔：《李鸿章的上台》，《东洋史研究》16卷2期，1957年。

⑬百瀬弘：《关于冯桂芬和他的著作》，《东亚论丛》第2辑，1940年。

⑭小野川秀美：《清末的洋务派运动》，《东洋史研究》10卷6期，1950年。

⑮北村敬直：《从清王朝角度看日中战争》，《史林》，35卷4期，1953年。

⑯田保桥洁：《近代日朝关系研究》2卷，京城，1940年；田保桥洁：《日中战役外交史的研究》，东京，1950年。

⑰矢野仁一：《日中战争后的中国外交史》，京都，1937年。

⑱波多野善大：《关于订立下关条约第六条第四款的背景》，《近代中国研究》第1辑，1958年。

⑲佐佐木正哉：《营口商人研究》，《近代中国研究》第1辑，1958年。

⑳野村浩一：《清末公羊学的形成和康有为学说的历史意义》，《国家学会杂志》71卷7期，72卷1、2期，1957—58年。

㉑小野川秀美：《清末变法论的形成》，《东方学报》，京都，第20辑，1950年；小野川秀美：《清末思想和进化论》，《东方学报》，京都，第21辑，1952年。

㉒板野长八：《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近代中国研究》，1948年；板野长八：《梁启超的大同思想》，《和田博士六十寿辰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51年。

㉓里井彦七郎：《十九世纪中国仇教运动的一个侧面》，《东洋史研究》13卷1、2、4期，1954年。

㉔江口朴郎：《关于义和团事件的意义》，《历史学研究》150辑，1951年。

㉕市古宙三：《义和拳的性质》，《近代中国研究》，1948年。

㉖村松祐次：《义和拳乱——一九〇〇年的政治背景》，《一桥论丛》26卷5期，1951年；村松祐次：《义和团乱的社会经济背景》，《一桥论丛》28卷4期，1952年；村松祐次：《义和拳乱、清廷、列强